

韩国

华侨史研究

崔承现 著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HONG KONG PRESS FOR SOCIAL SCIENCES LTD.

韩国华侨史研究

崔承现 著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 年 8 月

韩国华侨史研究

作 者 / 崔承现

责任编辑 / 陈 欣 金 文

封面设计 / 李权民

发 行 人 / 韩方明

出 版 者 /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金钟道 89 号力宝中心第 2 座 2006 室

电话: 852 - 2526 5338

传真: 852 - 2536 9223

电邮: china_ss_quarterly@21cn.com

排 版 / 龙浩国际交流出版公司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 龙浩中国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3 年 8 月香港初版第一次印刷

I S B N / 962 - 620 - 065 - 0

定 价 / 港币 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中国侨联
中国侨联
中国侨联

本书运用辩证的民族发展理论，以丰富的历史文献、统计报告和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探讨韩国华侨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指出：韩国华侨以中韩传统宗藩关系下的“上国”国民身份为出发，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华侨华人不同；韩国华侨作为近代历史的产物，在不断的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过程中演变成为韩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韩国华侨在冷战时代被迫采取“一边倒”的意识形态认同，以独特的“沉默”方式应对生存环境，但在多极化的后冷战世界是“韩”“华”兼容、“和而不同”的“多元”主体，等。本书既为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国别案例，也为中韩中朝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崔承现

作者简介

崔承现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韩国国立丽水大学中国学系教授。1968年生于韩国光州，1992年留学中国，1993年入北京大学，师从张注洪教授和何芳川教授攻读中国现代史和亚太地区史，先后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2000~2002年任中国曲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教授中韩关系史、亚洲史等课程。2002年返回韩国，被聘为国立丽水大学中国学系教授，教授中国史等课程，从事中韩关系史和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在中国发表的论文有：《抗战时期中国关内地区朝鲜义勇队的抗日活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韩国人的中国观》、《东亚研究的历程》、《关于韩国华侨当地化问题的考察》、《转折中的旅韩华侨》等。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韩国学丛书

杨通方 主编

序 言

近年华侨华人问题日益引起各界的重视,各种著述和新闻报导层出不穷,以诸如“华侨”、“华人”或“华人经济圈”为主题词利用互联网进行检索,结果之多将令人叹为观止。于是,欢欣鼓舞地将华侨华人研究看作方兴未艾的“显学”者有之,雄心勃勃地将华侨华人研究作为学科进行理论规划者亦有之。然而,或许是所谓数字化时代的特性使然,当代华侨华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数字化繁荣,虽然关于华侨华人的论述充斥各类书刊杂志,令人目不暇接,但这些论述大部分或者是低水平的重复,或者是非学术的想象,或者是功利性的杜撰,实事求是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别具新意和启发性的原创作品屈指可数。实际上,作为华侨华人的祖籍国的研究者,即使对于与我国山水相连、一衣带水的周边国家的华侨华人的情况,我们的了解和认识也是有限的,韩国华侨即属此类。

惟其如此,承现兄《韩国华侨史》的出版是有相当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的。作为一部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专著,《韩国华侨史》运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详尽的统计数字,特别是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等田野调查资料、现代科技支持的网络资讯等,对1880年代至今百余年的韩国华侨历史进程进行了周密和深入的考察,其观点之明确,体系之完整,逻辑之清晰,超出了已有的韩国华侨问题研究。由于承现兄身为韩国人而留学我国的特殊身份和学术经历,《韩国华侨史》提出了不少别具只眼而值得注意的观点。

例如,关于华侨史的起点。我国迄今所出版的华侨华人史著作,无论是全球性的、地区性的,还是国别性的,各种通史性或概论性著

作都追溯至秦汉唐宋,至于大陆迄今惟一的朝鲜半岛华侨华人史《朝鲜华侨史》更以两千年前殷商箕子作为韩国华侨的始祖。这种倾向固然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古代中外关系史和移民史的研究,但不无将华侨华人史无限上延,从而将华侨华人史分期复杂化之嫌,实属画蛇添足之举。实际上,国际移民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现象,但华侨华人无疑是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产物,是传统中国被编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后才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的。作为华侨华人的前史,对传统时代中国人的国际移民尤其是闽浙粤海商集团的国际活动进行全面的追踪考察是必要的,但据此将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现代侨民及其后裔——华侨华人的历史起点提前到古代纯属多余。《韩国华侨史》不从众说追溯汉唐,甚至不以我国普遍采用的近代史起点“1840年”为韩国华侨史的起点,而是通过考察和分析19世纪中后期中韩关系及其向近代的演变,将为传统的宗藩关系披上近代条约外衣、从而为韩国华侨提供基本发展条件的《朝清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签订的1882年作为韩国华侨史的起点。这种作法颇值研究与我国具有悠久关系的近邻诸国的华侨华人史借鉴和参考。

再如,关于韩国华侨的特性。世界的华侨华人形象主要是根据东南沿海出身、以东南亚和欧美为居住地的华侨华人勾画的,难免其过分的概念化和一般化,因此需要以丰富的国别案例加以充实和完善。《韩国华侨史》不是简单地以世界华侨华人的普遍形象为标准考察韩国华侨,而是从中韩两国及中韩关系的历史进程和韩国华侨的实际情况,分析、归纳和总结韩国华侨不同于其它地区的华侨华人的特性,指出:韩国华侨是作为受到中国强大政治保护的传统华夷秩序的宗主国即“上国”国民,进入朝鲜半岛并开始其在韩国的历史的;韩国华侨在保持华夏的种族性和文化性同时参与韩国及韩国民族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华夏种族属性的丧失,而是以种族属性的质变为基础而进行的“韩国民族”的创造过程;韩国华侨的发展由于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的作用,表现为中国公民或外国人的外在形式与韩国化的实际内容之间的矛盾,在“无意识的同化”与“有意识的异

化”之间被迫采取“沉默”作为适应方式,等等。这些观点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

此外,《韩国华侨史》以相当多的篇幅阐述了台湾当局的侨务工作对韩国华侨的作用及其消极影响,同时批评韩国政府从引进世界华侨华人资本和建构世界性韩人网络的实用主义角度对待华侨的错误,指出:“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将华侨或韩人工具化的政策和作法都可能达不到既定的目的,而是适得其反,产生消极后果。华侨和韩人在1930年代都曾被日本帝国主义当作殖民和侵略的‘手段’而饱受痛苦,这种历史悲剧不应重演。一百余年的韩国华侨历史进程证明,韩国华侨是与韩民族共创韩国历史的一个主体,韩国华侨是韩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应该被看作利用的对象。”这种告诫值得决策者特别是侨务决策者深思。

当然,《韩国华侨史》也难免其不足甚至可能错误,如某些观点需要进一步论证,文字需要进一步润色等。但作为一部外国青年学者的著作,我们不必求全责备,特别是不应该要求它完全符合中国人的思维和逻辑。实际上,《韩国华侨史》的现实意义之一即在于它出自一个韩国人之手,是一个外国人针对我们所关注的华侨华人问题向我们提出对话。

承现兄风度翩翩,才华横溢。1992年他从韩国负笈来华,1993年入我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张注洪教授和何芳川教授攻读中国现代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史,先后获得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0年到韩国人景仰的儒学圣地——山东曲阜的曲阜师范大学任副教授,教授亚洲史、中韩关系史和韩国学。2002年返回韩国,现执教于韩国国立丽水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中国学。他既专注于学术理论探究,又致力于促进中韩学术交流,可谓学有所成,事业如日中天。作为同龄人,我祝愿他家庭幸福,事业成功。

陈文寿

2003年6月4日于无为书屋

目 录

序 言	陈文寿(1)
绪 论	(1)
一、关于韩国华侨的认识变化及其研究成果	(5)
二、研究方法和目的	(17)
第一章 韩国华侨历史诸问题	(18)
第一节 概念及其范围	(18)
第二节 历史起源	(22)
第三节 历史分期	(24)
第二章 韩国华侨历史的起始(1882 ~ 1894 年)	(26)
第一节 韩国华侨生成的历史背景	(26)
第二节 华侨历史的起始	(28)
第三节 华侨的早期活动	(35)
第四节 华侨经济活动的特色	(37)
第三章 韩国华侨历史的曲折(一)(1895 ~ 1910 年)	(49)
第一节 历史背景	(50)
第二节 华侨受难历史的开始	(52)
第三节 华侨的经济活动	(54)
第四节 华侨的性质及其特点	(57)

第四章 韩国华侨历史的曲折(二)(1910~1945年)	(60)
第一节 历史背景	(60)
第二节 华侨的经济活动	(61)
第三节 中韩种族矛盾	(79)
第四节 华侨的特点	(85)
第五章 万宝山事件与韩国排华(1931年前后)	(96)
第一节 事件的经过	(96)
第二节 事件的背景	(103)
第三节 历史意义	(118)
第六章 韩国华侨历史的过渡(1945~1953年)	(123)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韩国华侨历史的混乱	(123)
第二节 华侨经济的复兴和畸形发展	(124)
第三节 华侨政治认同的形成	(130)
第四节 朝鲜战争与华侨向台湾一边倒的“意识形态认同”	(132)
第五节 华侨法律身份的变化与国家认同	(141)
第七章 韩国华侨历史的坎坷(1953~1980年代)	(144)
第一节 战后华侨历史的基本背景	(144)
第二节 以“华侨协会”为中心的华侨社团	(147)
第三节 作为侨民教育的华侨教育	(154)
第四节 华侨人口增减及其经济活动	(160)
第五节 华侨新事业的开拓及再移民趋势	(170)
第六节 华侨的多层认同	(173)
第八章 韩国华侨的近期状况(1990年代)	(177)

第一节 调查的内容及结果	(178)
第二节 “无意识的同化”与“有意识的异化”	(182)
第三节 韩国华侨的适应方式——“沉默”	(186)
 第九章 韩国华侨的新时代(1990 年代至今)	(188)
第一节 客观环境的变化	(188)
第二节 主观条件的变化	(194)
第三节 韩国华侨发展的若干问题	(199)
 结 论 从“上国”国民到多层认同	(210)
一、韩国华侨的历史发展过程	(211)
二、韩国华侨的适应方式和前景展望	(212)
 参考文献	(218)
 附录一 问卷调查之一	(225)
附录二 问卷调查之二	(229)
 后 记	(233)

绪 论

在过去的数世纪,近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史”。各个国家及民族在世界体系之下,从各自所处的特定位置向近代前进。然而,这一过程的强制性引起了个人之间、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并常伴以战争。1940年代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全球分裂性的冷战体系,使近代各种摩擦和矛盾降到了次要地位。虽然人类理性和实践到1980年代终于战胜了冷战,但隐藏在冷战结构中的“近代”恶魔再次浮现。人类只有依靠理性和实践的武器与“近代”恶魔展开激烈的斗争,才能获得新的发展。尽管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历史的辩证法证明痛苦促进了人类的发展。

1980年代以来的亚太地区也不例外,为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繁荣而进行的实践活动方兴未艾。1980年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揭开序幕,1989年APEC取而代之并逐渐扩大,它将成为以亚太地区共同发展为宗旨的常设结构。可是这种努力本身也隐藏着近代的恶性。美国根据所谓的“近代价值”逻辑,把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关系看作“生死攸关的利益”,主张“APEC最终将包括所有的区域国家,必须朝着支援后进国家和确立更加开放的国家间经济交流体制的方向发挥主导权”。^[1]而各种非政府组织(NGO)和发展中国家则批评“美国通过APEC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图重演哥伦布对未开发国家的征服事业和掠夺行为”,把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规定为新帝国主义。^[2]显然,近代的惯性即“单一绝对价值”的逻辑依然

[1] 何芳川:《太平洋时代与中国》,北京大学,1995年,第23页。

[2] <APEC在菲律宾>,《HanKeaLe21》[韩国],1996年12月5日。

在当代世界发挥着作用,人类需要继续为克服近代的“绝对性”而努力。

在所谓近代价值的普遍强制之下,国家或民族是竞争的单位,具有双重属性的移民集团因此经历了最为惨烈的痛苦。他们既被视为“间谍”或“灰色分子”,又是同化或融合的对象。移民集团的母国从国家利益的标准出发,决定对移民集团的利用或保护的程度。各个移民集团的存在方式,取决于母国的影响力和国家之间的力学关系。

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更为明显地超越了国家的界限。这种全球化潮流为移民集团提供了再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各个国家和地区更为关心移民集团的情况。这种关心的出发点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第一,近代民族主义的角度,认为移民集团的同化是一种进步的过程。即,国家内部族群之间的矛盾,只有少数族群被多数支配族群同化,才能够消除。因为近代以前的各种文明都向一个绝对价值前进(或强迫“前进”),所以各种文明之间或各种族群之间的融合只是一个完全同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出发,同化只不过是向“快乐”前进过程之中的“痛苦”而已;^{〔1〕}第二,超国家主义的角度,认为移民集团是超越国家范围的散居者(Diaspora)。^{〔2〕}即,打破把国家看作国际活动的基本单位的看法,将在世界各地散居的移民集团看作能够进行国际活动的另外主体;第三,辩证唯物主义民族论的角度,认为移民集团是形成中的或发展中的当地“民族”的组成部分。这种认识以开放的“民族论”为其前提,把“种族”或“族群”从“民族”中区分开来,认为各个种族互相融合,经过质变而形成一个民族。

〔1〕 歌德《东西诗歌》之〈给祖莱卡〉:“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50页。

〔2〕 Wang Gungwu, “A Single Chinese Diaspo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Canberra, December 1999.

中韩两国在地理上相近,在历史上关系密切,近代命运更是彼此相同。19世纪中韩两国被迫接受同样内容、同样形式的“近代”,两个民族都经过了痛苦的近代历程。即,中韩两国都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在获得自由后又被迫接受因意识形态对立而造成的内战和分裂。这种扭曲的近代历史经验不仅一直未得克服,而且还发展为一种不完全的政治形态,遗留至今。

中韩之间移民集团的历史直接反映了中韩两国痛苦的“近代”过程。“近代”摧毁了两个国家的传统体制,导致了大规模的流民集团,其中一部分分别越过中国和韩国的边界,开始了他们作为移民集团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他们时常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大陆政策所利用,经历了由近代而造成的最大苦难。随着美苏对立而来的冷战又一次使他们失去正常发展的历史机会,他们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牺牲品。

本书是关于韩国华侨历史的专门研究。由于所谓“韩国”在概念上的模糊性,所谓“韩国华侨”的范围自然成为问题。根据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将韩国华侨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自1882年至1945年之前居住在朝鲜半岛的华侨的历史和自1945年至今居住在三八线即停战线以南的“大韩民国”的华侨的历史。

韩国华侨的历史,在其起源、内容和现状等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的历史存在某些差别:第一,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是近代的产物,几乎没有一个是以支配阶层的身份开始其历史的,而韩国华侨是以“上国”国民的身份开始其历史的;第二,韩国华侨处于与中国东北(“满洲”)韩人^{〔1〕}相比的地位,满洲韩人的处境直接影响韩国华侨的历史;第三,中韩两国都经历冷战的过程,特定意识形态成为规定韩国华侨特殊性的一个因素;第四,韩国华侨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台湾当局的政治影响。

〔1〕 指当时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韩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作为“朝鲜族”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虽然韩国华侨具有如上的特殊性,但它的整体面貌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并无不同。韩国华侨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韩国的历史过程,摸索着与韩民族融合的道路。他们作为中国人从母国移植来的“华夏种族”的特性,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与韩国诸因素互相融合,从而创造出兼容“华”和“韩”的“韩国华侨”。所谓“韩国华侨”是作为开放的韩国民族的组成部分,“韩国华侨”的认同是韩国华侨历史过程的核心内容。

然而,作为“韩国华侨”的双重属性没有被近代民族主义所包容。1948年建立的大韩民国政府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迫他们完全同化或完全异化。^{〔1〕}在冷战体制之下,台湾当局根据“争民之战”的政治目的,对韩国华侨积极行使“国家权力”,强迫他们完全异化于韩国社会。这种外部环境赋予韩国华侨以“外国人”或所谓“中华民国”的海外公民的形式,最后甚至使其形式压倒了韩国华侨历史的实际内容——当地化。

1992年中韩建交是韩国华侨历史的转折。近年中韩各方面交流迅速扩大,韩国华侨也随之引人注目。可是对韩国华侨的这种关心从属于某种目的,存在许多问题。韩国是韩国华侨生活的国家,而且是其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因此韩国对华侨的理解及政策是最关键的因素。目前韩国对韩国华侨的关心,按其目的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为了中韩交流的深化以及引进世界华侨华人资本而利用韩国华侨,这是经济性的目的;其二是为了以韩国为中心而组成全世界500多万人的韩人网络,这是政治性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的,首先要提高国内少数民族群——韩国华侨的待遇,而后以其为根据要求韩人所属的当地政府提升当地韩人待遇,从而加强世界韩人向母国的爱心,组成世界韩人网络。韩国对韩国华侨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

〔1〕 1948年成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由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而采取颇为开放的对华侨政策,但1960年代回归基于民族主义的“完全同化”或“完全异化”。

以近代国家主义为根据而产生的,是欲歪曲本质而达成目的。一个实在的本质,若为某种目的的实现而被利用,最终无论其目的达成与否,都会遇到连其本质都被否定的危险。

中国和韩国以及两国之间的移民集团,都经过了近代历史的痛苦,同时也养成了克服其痛苦的能力。在近代历史过程中,两国的移民集团都是在殖民主义、当地和母国的统治阶级以及当地多数族群的三重或四重的歧视和压迫下成长的。笔者认为对这种移民集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当前的时代要求的,即对它的研究将会成为克服近代消极、封闭的民族主义,从而实现“多元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根据。

一、关于韩国华侨的认识变化及其研究成果

华侨华人是近代历史的产物。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影响了华侨华人的历史进程,而战后民族主义趋势左右了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与华侨华人有关的近代历史的特性可以归纳为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韩国华侨历史亦不例外。所以,关于韩国华侨的研究,可以根据研究主体的性质并按时间顺序整理归纳如下:

首先根据研究主体的性质分析对韩国华侨的认识变化及其研究成果。

要了解作为移民集团的韩国华侨的历史过程,首先要探讨其客观条件,尤其是中国和韩国对韩国华侨的认识以及政策。近代中国和韩国历史经历各种曲折,因此影响韩国华侨历史的国家权力也比较多,按时间顺序为:清朝、朝鲜、日本、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含台湾地方当局)、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此,对韩国华侨的研究以各自不同的国家及意识形态为背景,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整理和分析资料,最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首先是日本。它最早以韩国华侨为对象进行研究(包括亲日派韩国研究者)。由于甲午战争清朝丧失了朝鲜的政治特权,韩国华侨也失去了政治后盾,但他们依然保持着相当的经济势力。从日本